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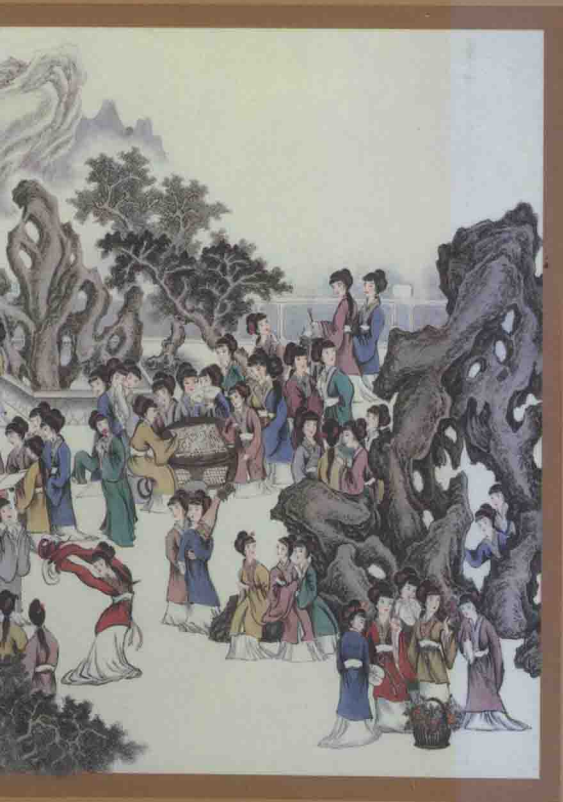
中华美学学会
徐州师范大学美学研究所

合办

审美文化丛刊

徐放鸣 李丕显 主编

第3期/2004年号



◎ 新华出版社

文化丛刊

第3期/2004年号

徐放鸣

李亚显 主 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新华出版社

目 录

加强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研究	陆贵山 1
回首美学旧案	李丕显 7

马列文论研究

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复归”	李益荪 18
试论当代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根本区别	朱慧珍 28
马克思文艺理论的批判性否定之思	姚朝文 35

基础理论研究

关于后现代美学	陆 扬 45
审美自由与诗意生存一解	周建萍 58
凝望的距离	陈 娟 66

艺术与审美研究

从棋理看画理	高建平 72
艺人相轻现象的美学阐释	杨曾宪 86
从早期艺术与宗教的关系看艺术的发生	王志明 97
建筑艺术偶识	李英梅 105

中国古代审美文化

让渡与整合：“才”到“诗才”的递嬗

- 明清言情小说“以诗论才”的文化心理分析 赵兴勤 赵 犇 113
- 胡祇遒戏剧美学思想述评 吴建民 119
- 史传传统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双向“塑造” 武传阳 127
- 柔婉的抒情诗 冲淡的水墨画
- 江南私家园林的审美风韵 史玉辉 139

中国现代审美文化

-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启蒙 姚鹤鸣 147
- 当代批评的文化求索 李凤亮 158
- 女性的成长
-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写作的发展历程 于东晔 175

西方审美文化

- 赫尔德论审美趣味 张玉能 187
- 坚持地球上古老价值的生态诗人
- 加里·斯奈德创作思想探析 贺 莉 200
- 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21届年会暨“马克思主义文论
与文学的当代性”学术研讨会综述 孟宪浦 210

附录：《审美文化丛刊》第1期、第2期目录

编后记

加强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研究

陆贵山^①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872)

文艺思潮作为连接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中介是最活跃的部份。文艺思潮包括文艺创作思潮、文艺批评思潮和各种文艺理论思潮。从思潮角度,研究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是可行的和有效的。

研究中国文艺和中国文艺理论的当代性,首先要研究中国文艺思潮的当代性。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结构是多元的,有前现代的因素,现代的因素,也有后现代的因素。界定中国文艺和中国文艺思潮的当代性或现代性,首先要确认当代中国的国情定位。中国的国情定位,从总体和全局上来说,不可能是前现代的,更不能说是已经到了后现代,甚至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现代。实际上,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的国情定位应当确认为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与生成。我们开始摆脱了前现代的宗法制的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作为全党全民奋斗的宏伟目标,现代化的事业还没有完成,到达后现代和后工业社会还要走很长的路,还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关涉历史的一切问题,都要放到所属的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才能得出

^① [作者简介] 陆贵山,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

科学的结论。界定文论的现代性或当代性，也应当将其放到所属的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框架里、阶段和过程中来加以研究，以免产生误读，从而造成时代反差和历史错位。

据个人的理解，当代中国影响比较大的文艺思潮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和新人本主义等。

尽管当代中国的发达地区存在着，甚至可以说日甚一日地滋生着、蔓延着后现代主义的因素，但它只能部分地适合于当代中国的国情，广大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还处于前现代的贫穷落后的状态；当代中国正从前现代走向现代。但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又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存在着质的差异性。西方发达国家的审美现代性反对社会现代性，反对科技理性和启蒙理性；当代中国的社会现代性，最需要科技理性和启蒙理性，否则，必然会阻碍社会的进步，更不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激活人们的思维方式，有利于消解那些我们应当消解的东西，但后现代主义不加区别地消解一切规律，明显违反“按规律办事”的原则，客观上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抵制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

新历史主义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历史理念出发，夸大历史文本和书写文本以及阅读文本的所谓互文性和亲缘性，把历史变成可写和可读的文学文本，主观随意性地把历史改写和重塑成一些人所喜欢和能接受的样子。这种新历史主义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可能帮助人们把被误读和误写的历史扶正和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真面目；同时又可能现表出玩历史、消费历史、篡改历史的非历史化的倾向。

新人本主义反对人的理性主义，主张人的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是新人本主义的基础、核心和灵魂。这种非理性主义的社会文化思潮对打破僵化的、腐朽的、压抑人的旧理性的精神枷锁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从非理性的领域释放和解放了人的思想、意志、情感和欲望。对人的个体化、主体化、内向化的潜意识研究取得了新的开掘和新的拓展，对全面地认识人的本质、结构和功能起到了

填补空白的作用。应当允许并满足人们的正常的合理的欲望和生理需求，但一味地抵制人的正当的理性，往往导致人的本能和生理层面的需求的泛滥，可能造成极端的个人欲望主义的膨胀，从而消解了大写的人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甚至诱使人们走向沉沦，陷入平庸化和鄙俗化、低级化和低能化。

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有本土的，但大量地表现为外域的、西方的、尤其是欧美文艺思潮的。我们要特别重视对当代中国本土的文艺实践和审美经验的理论提升和学术总结，提炼出真正具有中国当代特色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念。同时要承接和吸纳西方文论本土化的成果，同时要解决在西方文论本土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任何真理都是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具体性的，真理的普遍性寓于真理的具体性之中，又通过真理的具体性表现出来。任何学术活动都是求真，从研究对象中探索和寻找规律。这必然要求研究主体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意向，对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做出新的理论阐释。为了达到求真求新的目的，在西方文论本土化的过程中，应当特别强调“时”、“空”和“势”的概念。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同时规定着事物所包含着的真理的边界和适用范围。注重时间因素，一方面要追求与时俱进，推动文艺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不同历史进程中、不同社会条件下和不同文化语境里的国家、民族、人群和地域的文艺理论的历时性差异。注重空间因素，要适当强调不同地域和不同社会环境里的文艺理论的共时性差异。同时还要正视不同的文艺理论是“强势”还是“弱势”这种存在和发展状态上的差异。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尽管现当代西方文论是一种强势文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强势文论都必然是先进文论，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强势文论都一定具有可供选择的合理性和真理性。如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现当代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实际上只能部分地有限地适用于华夏大地上的发达地区，从整体和全局上说，不适合尚处于发展中的当代中国的国

情、人情和文情，与我国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历史发展进程存在着明显的历史错位。因此，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现当代的呈现出强势状态的文论。任何异地和外域的文论，都要经过有选择地本土化的变通和内化的过程。应当牢记“南方为橘”、“北方为桔”的古训，防止和克服各种洋教条主义所造成的迷误。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存在的都不一定是合理的。这两个哲学命题都是正确的。应当完整地辩证地对待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凡是具有真理性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东西，都应当为我所拥有。我们要建立的是具有当代性、民族性和世界人类性的新文论。为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宏观、辩证、综合与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质上是宏观文艺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马克思主义本身正是批判继承人类一切先进文化思想的创造性结晶。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同样要吸收、承接特别是20世纪以来文艺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放开眼光，博采众长，走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路。

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古今中外大体上存在着三大文论话语体系和四大文论学理系统，这三大文论话语体系是：西方文论话语体系和西方文论话语体系的本土化；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和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现代转换；马列文论话语体系和马列文论话语体系的中国化。我们应当把再创理论资源和倾听实践呼声有机地结合起来，重视对当代文艺实践和审美经验的学术概括和理论提升，重塑和建构出既有世界性、人类性，又有时代感、当代形态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文论。这四大文论学理系统是：研究“文”与“史”的关系，抽取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与“人”的关系，总结出来的各式各样的人本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与“美”的关系，概括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审美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和“文本”自身的关系，提炼出来的各式各样的文本主义文论学理系统。我们应当积极地自觉地整合上述各种文论学理系统所包含着的合理因素，建构起涵盖“文”与“史”的关系、

“文”与“人”的关系，“文”与“美”的关系和“文”自身的关系的及其相关学科形态，诸如文艺社会学、文艺人学、文艺美学和文本学有机融合的宏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体系。

还有两个学术热点问题，应当引起关注。一是要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正确理解和阐释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意义，厘清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是必要的，但也不能用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虽然文学也是文化，但文学存在着自身的独立性和规律性，至今并没有穷尽对一些重大的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文学消亡论是没有根据的。二是要研究科学文论和诗学文论的关系。作为两大学术思想体系，科学文论和诗学文论都有自身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空间。两者是相克相激、互融互动的。科学文论比较强调客观规律，诗学文论比较强调主观情感。用科学文论反对诗学文论，或用诗学文论反对科学文论，用反映客观规律反对表现主观情感，或用抒发主观情感反对揭示客观规律，都是不妥当的。科学主义反不掉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反不掉科学主义；现实主义反不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反不掉现实主义。正确理解和阐释文学中的“思”与“诗”的关系是一个十分繁难的常谈常新的重要的理论问题。

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元化，必然带来文论的多元化。20世纪的文艺理论，特别是西方的文艺理论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和极度的发展。对文艺的本质、结构和功能的多视角、多层面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新潮激荡，流派纷呈。各种文艺观念、批评模式都在各自所擅长的研究领域做出了新的开掘和新的拓展，对扩大学术研究的视野，挑选与优化其中有意义、有价值、有真理性和合理性的思想成分，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理论资源，运用马克思主义宏观、辩证、综合的思维方式进行鉴别与分析，从而通过吸纳、承接和转化，结合新的实践进行重塑与创新。我们需要一体、多元和主导的文艺理论格局。这种文艺理论格局是健全的、合理的，是有利于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的。无主导的多元可能造成混乱无

序、极端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无多元的主导又可能导致单调刻板 and 整齐划一，甚至可能造成文化的禁锢主义和专制主义。只有主导的多元和多元的主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既有主心骨，又充满着蓬勃的生气与新鲜的活力。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民族，没有一个统领全局的、占主导地位的、起主流作用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文化结构和价值观念是不行的，是不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只有建构起作为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标示先进文化的前进目标和发展方向的创新和开放形态的文艺理论，才能体现历史发展的新的需要，从而更加有效地弘扬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人文精神，更加有力地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实现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

回首美学旧案

李丕显^①

(徐州师范大学美学研究所 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内美学大讨论，体现了有限的学术自由，一方面难免其时代印痕和负面影响，一方面却也难能可贵。它带来了美学学科的发展与繁荣，大有利于独立的学术人格和独立的学术思考的培育，并且对哲学学科形成强大的“冲击波”，对其他社会科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导引出“美学讨论→美学热→文化热”这一学术、思想、文化历程，所有这些都已经显露出那一场美学大讨论的美学底蕴及其超美学的、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的意义。随着学术领域的政治批判的淡化，它在今后的多元化研究格局中还会显示其潜在的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学术争鸣；冲击波；独立人格；超美学

美学界总是缅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津津乐道其争鸣气氛和学术成就，甚至视之为学科发展的“黄金岁月”。可是并没有人去深究其美学论题背后的深层蕴涵及其超美学的、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的意义，更没有触及它的时代印痕和负面影响。因此，几十年后的今天仍有必要“回首美学旧案”。

^① [作者简介] 李丕显 (1943. 3—)，山东定陶人，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学研究所所长。

—

新中国建立之后十年左右，发生那么一场美学大讨论，着实来之不易。所谓正常的学术争鸣，在那样的大背景之下，也只能是在有限意义上的“正常”而已。

建国之初经过短暂的经济恢复时期，即在政治、经济领域展开大规模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三大改造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则有思想改造运动，批判“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批判萧也牧等人的创作倾向，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接踵而至的更有惊世骇俗的全国范围的揭露、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急风暴雨……在这样的政治、思想、文化气候之下，很难有真正健康的、正常的、深入的学术探讨。只是因为美学学科高高地悬在空中，距离政治敏感问题相当遥远，才由于偶然的机缘而热烈地讨论起来。然而悬在高空并不是真的处于真空。政治批判的阴影总还时隐时现。

学术混同于思想，思想混同于政治，进而牵连于革命与反动，可谓特定背景下的一大景观。例如对朱光潜先生解放前所宣扬的主观美论，辩证剖析其哲学性质应属学术争议，科学分析其主张、情趣与新文化运动不大合拍仍属正常讨论，可是硬要把学术问题同政治立场、革命反动挂起钩来，显然属于硬扣政治帽子。四十年代写出大批判文章《论约瑟夫的外套》的作者此时又抛出《论食利者的美学》一文，“上纲上线”，政治批判的气氛确乎是过于浓郁了。让人深感可惜而复可叹的“悲喜剧”是，这一位革命作者不久以后自己也被错打成了“右派”。“左的可爱”者恐怕不得不佩服“左的可怕”者的威力。

影响所及，直到“文革”之后，“大批判”的幽灵仍然不愿自动地销声匿迹。许多人经历了批人者被人批、囚人者被人囚的沉痛反思，蓦然梦醒。可是，沉重的习惯自会产生强力的惯性，人们一路

大批判走来难免有时候“积习难改”，难免习惯于大批判一路了。明明是学术争端，偏偏硬要指派论敌属于苏联美学界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严重流毒”，“欣然搬运苏联那种货色”——“公然贩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破烂货”；并且还要“看看它们究竟用的怎样卑劣的手段，打的怎样丑恶的主意，表现着怎样狂妄而又愚昧的本来面貌”。^{[1](p2)}更何况，这是在刚刚“解冻”以后即将万物复苏之时，也许会有人觉得真真有些“其可怪也软”！殊不知批判者并非“恶意攻击”，而是真诚地这样认为来着；由此一端倒是更可见出“左”的倾向害人不浅——教条主义、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之类以及纯熟运用这些牢什子作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锐利武器进行政治批判业已化入了、变成了人的深层意识、内在情结和真诚信仰。

被批判的一方呢？原来早已在那里真诚地检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此类自我批判一般都会经验这么一个心态历程：起初大为惊骇，迫于压力只好违心检讨；继而对“错误”、“罪行”有所认识，从言不由衷逐渐逐渐地向着真心认错转化和过渡；最后，别人讲得多了，自己也讲得多了，公众的认识似乎真的“化”成自己的认识，于是到头来果然是真正虔诚地认为就该这样来认识才是唯一正确的了。令人遗憾的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并非如此严重，带有误差的“共识”的形成却常常是以个人人格的被戕、独立思考的沦丧为代价的。

至于学术争端中对论辩对方的科学的辩证的分析，更是少得可怜。“学术讨论”成了一面倒。大家异口同声地批判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思想，包括他自己。几乎没有人讲到、甚至很少有人想到他的学术贡献。对唯心主义，当然难得再有辩证的态度。人人自称马列，却偏偏忘记了列宁的告诫，恰恰落入列宁的警示：“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

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它无疑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2](p411, 412)

尽管如此，相对于其他学科，美学大讨论毕竟是在热烈地开展着，所以至今令人难以忘怀。可是人们却又忽略了，美学的繁荣掩盖着的却是整个学术界的相当的凋敝。哲学主要成为经典注疏，历史学总在那里排列五大社会阶段的序列，文学的研究论著里老是弥漫着“经济→政治→文学”的公式；社会学、法学几乎无人问津，教育学、心理学步履蹒跚，人口学被批得一无是处，就连遗传学，也只剩下了米邱林……相比之下，美学的一枝独秀作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体现，或许又有了某种政治的意义了吧。

二

诚然，那一场美学大讨论的确有其令人难以忘怀的理由。当时曾就美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展开深入的探究，特别是围绕着美的哲学本质问题，居然形成了四大美学学派，多年以后仍旧导引着美学研究的大体方向和范围。虽然每一种美学观点都跟西方美学史、苏联美学界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但是它们终究是在新中国的学术天地里形成的，而且较之西方美学、苏联美学大大地深化和前进了。尤其是实践美学，当时即已蓬蓬勃勃，日后更有长足发展。

实践美学在当时和日后的不断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中对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择其要者如：关于美学的哲学基础，从反映论到实践观点再到主体性实践哲学；关于美的前提，从客观自然的人化到两种自然的人化再到自然的深层二重化；关于美感的性质，从美感二重性到悟性说再到审美自由论；关于美感的建构，从积淀说到建构说再到建立新感性——所有这些，拿到国际美学界来看，也都是处于学科前沿、学术前沿的研究。^[3](pp85-96) 作为哲学美学，美学

学科的深入研讨又反转过来充实和丰富了哲学的内涵，在某些方面超越和突破了哲学的现存成果和原有框架。从审美活动和美学研究的地位，从美学研究的对象的角度，以及对某些基本问题例如本体论问题的探讨上，都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例如，实践美学的许多主张有利于深入地准确地理解“实践的唯物主义”，纠正“正统认识”中的诸多偏颇：诸如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分割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并且说后者是前者的推广应用，把实践观点和唯物史观割裂开来从而使两者产生蜕变，把历史规律客观主义地讲成凌驾于人类历史活动之上的预成公式，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为唯心主义，不经深入研究动辄指斥别人为唯心主义、不可知论……而且，实践美学的好多基本观点及其哲学性的阐发，它所提出的哲学依据等等都具有相当普遍的哲学意义，对哲学学科形成强大的“冲击波”，由此延伸开去，对其他社会科学也会发生广泛的影响力。^[3](pp3—33)

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思想，也在这一场美学大讨论中有了巨大的进步和精深的发展。从解放前的主观美论，到五十年代的主客观统一论，再到六十年代提出和运用实践观点研究美学，还有他对美感经验的深刻见解，不满足于仅仅局限于反映论而主张引进意识形态学说，都能发人深思，给人启迪。

可惜的是，主观美论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这里实有多重原因：其一，主观美论自身在理论上缺乏足够的论证，往往以情绪化的语言、主观性的判断代替科学严谨的证明：“我”认定是什么就是什么，却不给出其断语是否具有逻辑必然性、普遍有效性的证明。其二，主观美论论者一方面确认美是主观、美是观念、客观无所谓美丑，一方面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又不能不承认反映论，当然会使论者自己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没有被反映者，怎么会有反映？（西方学者可以不承认反映论，则可免除此种尴尬。）其三，除了主观论者以外，其他学派普遍指定其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连解放前的主观论者也自认其属于唯心主义；更为严峻的是，隐隐地有一种“唯心主义=全盘

皆错=(≈)资产阶级观点=(≈)反动论调”的公式在人的灵魂深处暗中作祟，往往让人避之唯恐不及。其四，主观论者的情绪化的性格和作派又容易受到政治的干扰以至干预，有时候甚至会被剥夺发言权……如此数端，自然使得主观美论难以真正形成学者如林、大有影响的学派了。

而且，偌大的美学界若是总在那里争执美在主观、美在客观，极有可能束住手脚，或者犹如带着镣铐跳舞，或者就像磨道里面转圈。一者，论题范围过于狭隘；二者，认识限于主客二分；三者，话语系统难与世界美学接轨。既然那一场美学大讨论多年以后仍旧引导着美学研究的大体方向和范围，那么，不应回避、不能不正视的是，它在束缚手脚方面的影响也是难辞其咎的吧。

然而不管怎么说，有那么一场大讨论终究是一大幸运。不仅是美学的幸运，亦且是新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的幸运。美学讨论中提出的实践、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等，虽在当时主要限于美学的阐释，可是这些话语的背后却蕴藏着巨大的潜能，一旦遇上了适当的语境，就会剧烈地爆发出来。八十年代出现的“美学热”就是一次集中爆破。从学术层面上看，它是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延续和发展，参与者不仅有上次讨论中的学术骨干，而且涌现出许多美学新人，论题亦更为广阔，犹如我的一篇短文标题所引用的杜甫诗句：不尽长江滚滚来；从社会心理层面来看，它是“文革”十年美的压抑的反弹，是人人皆有爱美之心的展露，充分展示出真善美的人性向往和心理憧憬；从精神气候层面来看，新的思想解放的浪潮唤醒了老一辈学者的美好的回忆，激发了新一代学人的盎然的兴致，这才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同论美学课题、共商美学发展的壮观景致。

发展中既有延伸，同时也要求突破。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就是文史哲贯通融会的，本来就有宽泛而精深的美学精神，艺术精神。反过来讲，中国美学中交织融通着上层文化、下层文化中的深刻广泛的文、史、哲的意蕴。于是，“美学热”又导致“文化热”。好多美

学工作者由美学研究转向文化探索就是明证。一方面，美学论题向广阔的文化领域拓展了去；另一方面，由阔大的文化背景观照美学，势必预示着美学和文化学的共同繁荣，预示着两者的多元化的蓬勃发展。两者相撞相融，则又有审美文化学的勃兴。而审美文化研究作为美学与文化学相结合所拓展出的新的研究领域，似已成为当代美学转型的一个重要趋向，成为美学学科的具有先导性的研究热点之一。

“美学讨论——→美学热——→文化热”，这一学术、思想、文化历程，已经初步显露出那一场美学大讨论的美学底蕴及其超美学的、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的意义。随着学术领域的政治批判的淡化，它在今后的多元化研究格局中也许还会显示其潜在的深远的影响。

三

除去政治批判的阴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讨论的确应该说是比较正常、基本正常的，尤其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正常的学术争鸣培育出独立的学术人格和独立的学术思考，更是十分难得。回溯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这一点尤显可贵。

在两三千年的专制社会里，知识分子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加上他们自身的弱点，依附意识远远强旺于独立意识。孔孟一派热衷于入世，总想着为主人修齐治平，后来又形成越来越浓重的科举取士、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人士夫都挤到读书做官这一条狭窄的道路上来，更是梦寐以求内圣外王。就连那满怀离骚、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也是一味地傻乎乎地要去效忠于人家并不要他去效忠的楚王。李白狂放不羁，放浪形骸，笑傲王侯，蔑视权贵，薄周礼嘲孔丘，有时候也会拖出一条不大不小的庸人的小辫子——他漫游四方游说不少知名人物以求引荐，也曾写过一些自荐表，还想通过隐居树立声誉以求上达，无非是想要做官；想要做官，固然是要施展抱负，但是毕竟难免依附长安九天宫阙、留恋近臣富贵荣